

古代乍得湖地区胡鲁夫政体 政治经济形态演变^{*}

〔法国〕 奥古斯丁·霍尔/文 章 波/译

内容提要 在本文语境中,涌现复杂性是指社会形态的组织转变,即从移动的小型游牧部落和定居农业村落,最终形成政治集中的等级社会的过程。这是全新世中期乍得湖逐渐消退后,在非洲中北部乍得平原定居的乍得语族使用者的演变轨迹。本文分析了公元前 1900 年至公元 1800 年这一期间的定居点动态、政治经济、物质文化、交换模式等要素,概述了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阶段。通过简要回顾西非考古学中关于贸易的研究可以看出,对长途交换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特征分析和来源分析上。这两个变量虽然对重构交换网络非常重要,但却无法令我们了解接受社会的内部动态。因此,本文研究了长途贸易物品的地点、流向、分布和消费的变化,以及手工艺品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模式,说明了它们是连锁的反馈循环的一部分。这些偏离或放大的反馈循环触发了一种动态,导致胡鲁夫(Houlouf)在约四千年间出现了四个连续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 涌现复杂性 政治经济形态 长途贸易 乍得政体 胡鲁夫

作者简介 奥古斯丁·霍尔(Augustin F. C. Holl),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至第十一卷)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简介 章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 致谢 本文中报告的 1981 年至 1991 年实地研究得到法国外交部“发掘委员会”的资助(1982—1986 年)和国家地理学会#3715—87 号资助(1987 年),并得到法国合作部的研究指导(1987—1991 年)。非常感谢洛根-比尔尼(Logone-Birni)的穆罕默德·巴赫尔(Mahamat Bahr)苏丹、已故的哈桑纳苏丹、加拉迪马(Galadima)、来自胡鲁夫的所有长者及来自阿拉亚(Alaya)的比拉马·哈尔菲(Bilama Harfi)的重要帮助和支持。在此向连续 11 个野外考察季为胡鲁夫考古和民族考古项目提供帮助和有用信息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引言

今天的胡鲁夫是喀麦隆北部一个人口稀少的克托克 (Kotoko) 村庄。曾经有土城墙和护城河保护着这个古老的乍得政体,使其免遭突袭,如今依然可见的遗迹彰显其过去的荣光。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学家乔瓦尼·洛伦佐·达阿尼亚 (Giovanni Lorenzo d'anania) 在他的《世界建造法》(L'universale Fabrica del Mundo) 中提到胡鲁夫是 16 世纪非洲中北部的一个王国。1980 年至 1991 年在胡鲁夫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重现了它过去的辉煌,并追溯了这一神秘的乍得湖地区酋邦的形成过程。本文研究了这一酋邦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物质材料和商品的生产、消费及交换情况。这些商品的获取和使用维持了乍得盆地在过去 4000 年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

定居地点和模式的长期变化通常会形成文化景观,揭示过去的社会如何向环境妥协,从“不稳定”过渡到“亚稳定”状态。生产和交换也是如此。对史前交换系统的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过去社会的动态变化。耐用品的长途转移在考古记录中相对较为常见。但是,这些外来物品的记录是否表明存在一个交换系统?人们从 A 地区迁移到 B 地区通常会携带他们的物质财富,可能包括宝石和金属等个人装饰品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物质商品。如果这些物品最终进入 B 地区的考古记录,它们就很容易被解释为 AB 两地之间长途贸易的证据。然而在实际考古中,我们很难达到那样的准确性。取样程序和技术差异也使得比较分析极为困难。尽管如此,目前西非挖掘的一些遗址中记录的数据足以证明确实存在长途交换网络。将东西方与西非城市中心连接起来的跨撒哈拉的贸易网络是有据可查的。然而,我们对明确界定的区域环境下的货物流动和使用模式仍然缺乏了解,而这正是本案例研究所要揭示的。

显然,食品、制造品和贵重物品的长途贸易在西非社会体系结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通过确认原材料和单个物品的来源从而追溯长途贸易网络。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地点、交换系统和手工艺品生产模式的潜在规律,从而了解其中的机制,以及我们所研究区域的经济和社会进程。

研究计划

在全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乍得平原位于特大湖泊乍得湖的底部。在对距今约 8500 年的德夫纳地区 (Dufuna) 的挖掘表明,当时存在分散的觅食者群体,

他们使用船只航行，并对湖泊丰富的水生资源加以利用。^① 从全新世晚期到现在，由于受重大气候危机的影响，乍得湖的面积大小和深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于是中部乍得语族使用者在公元前 2000 年开始来到本研究区域。

1980 年在胡鲁夫地区启动的研究项目旨在重现该区域定居点历史及通常被称为“苏丹国”或“公国”的中央乍得政体。胡鲁夫公国的古老边界是阿巴尼（Abani）河，该河流自东南向西北流经整个研究区域。河流东北部的一部分属于库塞里（Kusseri）苏丹国，东部则属于卡贝（Kabe）国。划定的研究区域非常平坦，海拔在 290 米到 296 米之间，由一大片常年高于洪水水位的土地和每年泛洪的低洼地带组成。土地植被为灌木丛生的热带稀树草原，长有多刺的灌木和树木，其中主要是金合欢树。低洼地带是资源丰富的优质牧场。我们对胡鲁夫传统地界内记录的 14 个土丘遗址进行了检测。

此项发掘策略的实施旨在呈现清晰的文化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数据。胡鲁夫政体中心的中北部设置了一个较大的挖掘单元（按照当地标准），面积为 96 到 110 平方米。其他遗址则用较小的探测器进行了检测，面积从 9 平方米（马达夫）到 18 平方米（德格塞）不等。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对促进土丘形成的沉积单位进行识别。从土壤科学中借用而来的“地平线”（horizon）这一概念被改编为“占领层”（Occupation Horizon, OH），用以揭示土丘的堆积过程。土丘层序是由文化和自然等几个不同因素的差异性组合形成的。因此，考古发现所处的环境（废物坑、墓葬或房屋地面）对重构考古遗址中进行的活动非常重要。

胡鲁夫政体的形成

胡鲁夫地区的占领大约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约公元前 1900 年）。基于主要的环境变化和聚落模式，到公元前 1800 年左右，胡鲁夫地区前后被细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以最新建立的定居点命名。而陶器的大小、形状和装饰都明显具有当地特色，这表明每个定居点都有自己的陶工。

（一）德格塞（Deguesse）阶段（公元前 1900 年—公元元年）

德格塞阶段的占领在研究区域北部的德格塞和克雷纳克（Krenak）两地有记录，这两个地点相距 9 公里。德格塞阶段沉积层位于检测土丘底部位置，比今天的平原低 1.5 至 2 米。在德格塞（OH I）（4~4.5 米）和德格塞（OH II）（3.5~4 米），

^① Peter Breunig, "The Dufuna Dugout: Africa's Oldest Boa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Pan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Prehistory and Related Studies, Harare, 1995, p. 16.

以及克雷纳克 (OH I) (3.4~3.7 米) 的白色沙地上方, 发现了明显由厚实的家畜粪便、炉膛物和日常用物形成的沉积物。这些白色沙点是古老沙岛存在的证据, 说明在距今 3500 年—2500 年旱季湖岸面积缩小时, 牧民群体曾来过这里。

这些游牧营地表明, 胡鲁夫地区的早期居住者是流动的牧民。同时期的类似沉积物在很多地方都有记录, 比如位于古老的沙里河三角洲 (Chari delta) 的安库丘 (Amkoundjo) 和马达加 (Mdaga), 古老湖岸线沿岸东南—西北方向的苏布劳姆拉吉尔 (Sou Blame Radjil)、戴马 (Daima) 和库萨卡塔 (Kursakata) 三地, 巴马 (Bama) 岭以南的巴马路遗址, 全新世时期的大乍得 (Mega—Chad) 海岸线, 弗基 (Firki) 平原的施马 (Shilma) 以及尼日利亚乍得湖聚落群西端的加吉纳 (Gajiganna)。

(二) 克雷纳克阶段 (公元元年—500 年)

克雷纳克阶段分为 A (公元元年—250 年) 和 B (公元 250 年—500 年) 两个子阶段。这个阶段涵盖洛根 (Logone) 河宽广而延展的三角洲地区。洛根河当时自南向北流动, 水位和海岸线呈季节性波动变化, 为一个潟湖提供水源。研究区域北半部分的 3 个几乎等距的地点出现了克雷纳克 A 阶段的沉积物, 这 3 个地点分别是德格塞 (OH III 和 IV)、克雷纳克 (OH II) 和胡鲁夫 (OH I)。克雷纳克地区的主要沉积物仍然是牲畜粪便, 而在德格塞和胡鲁夫则出现了表明存在定居生活方式的倒塌及腐烂的建筑材料沉积物。

克雷纳克 B 阶段的定居点数量增加了一倍, 从 3 个增至 6 个。区域领地扩大到南部所有 3 个遗址——布雷 (Blé) 土丘 A、B 和 D, 集中在三角洲环境中。在克雷纳克阶段末期, 约公元 500 年左右, 该区域景观分布在 6 个土丘遗址中, 分为 4 个定居点, 这一时期的文化沉积物达 0.2 至 3.3 米厚。这些定居点之间的距离从 5 公里 (克雷纳克到布雷土丘) 到 10 公里 (胡鲁夫到布雷土丘) 不等。从理论上讲, 每个村设的选址范围半径覆盖约 2.5~5 公里。这一模式反映了这一时期农社自给自足, 从事农牧业经营, 广泛利用丰富水生资源的特点。

(三) 米什科瓦 (Mishiskwa) 阶段 (公元 500 年—1000 年)

这一阶段人类定居点扩大至泛洪的内陆粘土洼地, 其中 A 阶段 (公元 500 年—750 年) 有 10 个定居点, B 阶段 (公元 750 年—1000 年) 有 11 个定居点, 气候更加干燥。区域环境特征是湖泊或潟湖水位下降, 逐渐变成一系列池塘和沼泽。古洛根河三角洲逐渐淤积, 其辫状河道也在米什科瓦阶段末期淤积。区域定居点系统分为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

其中一个定居点是由 5 个遗址组成的密集集群, 包括位于东南部古洛根河三

三角洲的布雷土丘聚落群和克雷纳克 - 荇 (Krenak - Sao)。另一个位于西北部的集群也由 5 个遗址组成,分布在以胡鲁夫为中心的 3 到 5 公里之间。新定居点米什科瓦处于南部相对孤立的地点。这些定居模式的记录表明已经形成两个亚区域集群,区域社会政治组织似乎已从自给自足的自治村庄网络转变为相互竞争的小政体。

(四) 布雷阶段 (公元 1000 年—1400 年)

米什科瓦阶段记录的定居模式一直持续至布雷阶段,位于东南部的布雷土丘聚落群和位于西北部的胡鲁夫集群在这一阶段更加紧凑,边界更加鲜明。米什科瓦似乎仍然是南部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村庄。乍得湖的湖面高度在海拔 285 米左右波动,气候持续趋于干燥。古洛根河三角洲完全被泥沙淤积,这条河向东北改道,流向更加庞大的沙里河 (Chari) 水系,形成了一系列自东南向西北流动的间断小河道。阿巴尼河在克雷纳克 - 荇的河道有 30 米宽,马琳加河 (Malinga) 在胡鲁夫的河道有 18 ~ 20 米宽,其河床可能在布雷 A 阶段的较早时期 (公元 1000 年—1200 年) 就已开始挖掘。

这一阶段的景观包括季节性泛洪的肥沃沼泽地,还有几条蜿蜒的河道。胡鲁夫土城墙是在布雷阶段建造的,其最大延伸面积达 15.9 公顷。布雷土丘聚落群显然是一个相互竞争的政体的中心。在布雷阶段末期,研究区域形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社会经济形态:南部米什科瓦的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治村社,东南部由 5 个密集土丘构成的布雷土丘聚落群政体;以及一个以胡鲁夫土城墙定居点为中心的地区政体,其外围遗址距离中心 3 至 5 公里不等。

(五) 胡鲁夫阶段 (公元 1400 年—1800 年)

在胡鲁夫阶段,定居点的数量从 9 个减少至胡鲁夫子阶段 A (公元 1400 年—1600 年) 的 3 个,子阶段 B (公元 1600 年—1800 年) 则为 7 个。位置上则向内陆粘土洼地雅哈雷 (Yaéré) 地区转移,同时期胡鲁夫成为同名公国的中心。德格塞、哈梅、胡鲁夫、马达夫 (Madaf) 和米什科瓦是永久性定居点,而阿玛施塔 (Amachita) 和索罗罗 (Sororo) 两地则有特定用途。

在胡鲁夫阶段初期从公元 1400 年到 1450 年的半个世纪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乍得湖完全干涸,变成了一个个浅层积水的死水潭。公元 1600 年左右,气候恢复到更加潮湿的状态,导致洛根河河道形成了今天自南向北的流向。阿巴尼河和马琳加河成为季节性溪流,排走了洛根河的季节性溢流和泛洪沼泽地里的水分。研究区域目前的景观就形成于胡鲁夫阶段早期。它包含了一大片由常年高于洪水水位的泥沙淤积而成的东南 - 西北走向的土地,植被为荆棘丛生的热带稀

树草原。作为研究区域面积较大的内陆粘土洼地，胡鲁夫具有较高的放牧价值，地下水位较高，易受季节性洪水的影响。它当时是这个乍得政体的政治中心，建有富裕精英的公墓和统治者宫殿。在胡鲁夫阶段末期，这个政体被拉万（Lagwan）王国征服，并被整合为其北部边境。

胡鲁夫地区的定居史始于公元前 2000 年，居住者为此前旱季定居在乍得湖沙岛上的流动游牧部落。这一时期的沉积层比现在低 1.5 到 2 米，考古发掘很难找到，导致我们无法对遗址的密度作任何估计。如前所述，德格塞阶段的生存定居战略非常强大，从公元前 1900 年到公元元年，共延续了 2000 年。在克雷纳克阶段（公元元年—500 年），流动的牧民捕食者和自给自足的定居自治村庄共存，这表明人口在缓慢稳定增长。在米什科瓦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定居点扩大到整个研究区域，并形成了 3 种截然不同的定居点组织形式：南部自给自足的孤立自治村社，东南部紧密聚集的多土丘复杂政体，以及北部的一小块领土。米什科瓦阶段开始形成的同类政体竞争在布雷阶段（公元 1000 年—1400 年）达到顶峰，胡鲁夫政体在该阶段崛起，并在整个胡鲁夫阶段（公元 1400 年—1800 年）延续。胡鲁夫政体最终被不断扩张的拉万王国征服，成为其北部边境，直至 20 世纪初被德国殖民者征服。

工艺活动和生产模式

工艺活动和生产模式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端可以是小规模 and 高度不连续的活动，另一端可以是密集的全天候专业工艺生产。根据目前从相对小型的挖掘探测中获得的考古记录来看，要在小规模的家庭手工生产和面向特定区域及长途交换网络的密集生产之间划定清晰界限相当困难。尽管如此，已记录的生产遗迹的频数和规模仍然可以充当一个代理变量，揭示某些真相。

研究区域的考古记录显示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陶（器皿和头枕）、制盐、密集捕鱼和熏鱼、铁和铜合金冶金，以及染布。不言而喻，在所有测试的定居点和所有存在记录的阶段中，这些生产活动所占的比例并不均衡。尽管如此，记录的考古序列也将帮助人们了解胡鲁夫政体的社会和经济动态。

（一）早期的德格塞和克雷纳克阶段

在早期的德格塞（公元前 1900 年—公元元年）和克雷纳克 A 阶段（公元元年—250 年）的定居点，生产和工艺活动的证据非常有限。在德格塞阶段的沉积物中发现了少量带螺纹装饰的薄碎片。克雷纳克 A 阶段定居点中出现了 4 至 9 种

形状的器皿，克雷纳克 B 阶段则出现了 1 至 6 种形状的器皿。克雷纳克 A 阶段流传下来几种传统陶瓷器皿。似乎每个自给自足的定居自治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制陶是胡鲁夫地区考古记录中出现的基本工艺，研究区域普遍存在优质粘土，桨叶、铁砧和卷取是主要的生产技术。制作碗和小罐子等较小的器皿时会加入稻草，制作较大的罐子和贮藏容器时则会加入沙子。制陶很可能是一种季节性的活动，塑造好的器皿会被放在篝火中烧制。

除了制陶，在克雷纳克 B 阶段的定居点还发现了与一项新生产活动相关的锻造装置。在这一阶段的定居点中发现了铁器和矿渣。有记录的铁制品包括矛、刀、匕首、戒指、斧头和锄头。生产铁制工具的矿石来源于沉积物。在最为干旱的季节，当土地被烤干时，人们会从不同的地方收集沼铁矿。这些沼铁矿被装到篮子里运至储存有木炭的村子。沼铁矿被打碎成小块，工人会将木炭和铁矿（最好是厚度相等）交替放进以粘土和马粪制成的坩埚为底的熔炉中进行冶炼。冶炼作业要持续一整天才能获得一块较小铁坯。在冶炼结束时，工人会将熔炉底部拓宽，将坩埚打碎以收集铁坯。阿拉亚酋长比拉马·哈尔菲认为，雅哈雷沼铁矿质量优良，优秀的熔炼工在生产铁坯时留下的矿渣和副产品很少。^①

胡鲁夫（OH II）的锻造装置包括两个叠加和部分露天的冶铁作坊。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圆形小屋的一部分，或像是一个最大直径为 5~6 米的场所。早期的作坊装置由一个小型的细长锻造熔炉组成，附带一个圆形的风箱底座。后期作坊的锻造装置较为精细，有一个复杂的通风系统，由三个圆形风箱底座连接到一个通向熔炉的大风口。在两个作坊的地面上都发现了一些铁渣。

（二）米什科瓦阶段

米什科瓦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定居点的生产活动范围更广，包括陶器烧制、鱼肉加工和熏制、染布和铁加工。有记录的容器形状从 A 阶段（公元 500 年—750 年）的 1 至 4 种增加到 B 阶段（公元 750 年—1000 年）的 2 至 18 种。这些有记录的不同形状的容器包括简单的孔口罐子、球状和半球形罐子、大罐子和碗，作用趋向于储存和烹饪食物和液体，均为家用。在胡鲁夫（OH III）发现了一个陶器烧制区，是一个经煅烧硬化的圆形遗迹，直径 2 米，厚 0.2 至 0.3 米，颜色为鲜亮的粉红色，与另外一处遗址的陶罐烧制区特点相同。该遗迹包括一个直径 0.25 米、深 0.25 米的小坑，内有一只充当祭品的未成熟绵羊或山羊的完整骨架。

^① Augustin F. C. Holl, *The Land of Hulouf: Genesis of a Chadid Polity 1900 BC – 1800 AD*, Ann Arbor: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在胡鲁夫 (OH III)、布雷土丘 A (OH III) 和克雷纳克 - 苕 (OH I) 三地米什科瓦阶段的沉积物中发现了鱼肉加工和熏制遗迹。胡鲁夫 (OH - III) 的鱼肉加工遗迹是一个小的圆形鱼肉发酵池, 深 0.5 米, 直径 0.5 米, 内墙用平滑的未烧制粘土粉刷, 以增强其密封性。清洗干净的鱼被放在陶罐中发酵一到两天, 通过晒干或熏制后再食用或保存。布雷土丘 A (OH III) 和克雷纳克 - 苕 (OH I) 的装置是熏鱼“烤炉”。布雷土丘 A 遗迹呈圆形, 直径为 0.6 ~ 0.8 米, 深度为 0.5 ~ 0.3 米, 原始高度未知。克雷纳克 - 苕装置呈细长的马蹄形, 长 1 米, 宽 0.6 米。目前的记录中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熏鱼技术, 一种在圆形“烤炉”中进行, 另一种在细长装置中进行。小鱼直接晒干, 大鱼在清洗干净后被切成拳头大小的鱼块。每块鱼上都会插上一根干芦苇, 在阳光下晾晒几小时。之后鱼块被放进圆形熏鱼池中, 被烈火熏制一段时间。脱水后的鱼块为半熟品, 有一层厚厚的碳化保护外壳, 需日晒 4 至 7 天, 之后再次熏制。此时细长马蹄形装置的顶部会放上一个木架, 下面燃起小火, 以制造烟雾。鱼块被放在木架上, 上面铺两三张芦苇垫, 熏制 6 天。据称最终的成品非常美味且质量上乘, 且据推断从克雷纳克 B 阶段 (公元 250 年—500 年) 起, 晒干是一种常见的保存方法, 与更复杂的劳动密集型熏制技术并行使用。^①

除了德格塞和阿玛施塔外, 所有的检测点都记录了纺织、纺锤轮的间接证据。染布的直接证据只在布雷土丘 A (OH IV) 的记录中出现过一次。该证据是一个压碎的大敞口罐子, 四周散布着紫色和靛蓝色的坚硬外壳。记录显示, 研究区域在 19 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染布行业。征服和兼并胡鲁夫政体的拉万王国以其染布行业闻名, 尤其是一种名为托布 (tobe) 的布料, 这种闪亮的黑色布料被用来制作华服, 在博尔努 (Bornu) 地区非常受欢迎。拉万王国每年向博尔努苏丹国进贡的贡品就是 100 匹托布和 10 个年轻的奴隶。德纳姆 (Denham) 等人沿着从当时博尔努王国的首都库卡瓦 (Kukawa) 到洛根 - 比尔尼的路线, 绘制了 19 世纪初研究区域大片棉花田的地图。^② 大约 30 年后, 巴特 (Barth) 发表了关于洛根 - 比尔尼密集纺织工业的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该地有大量生产作坊, 产品出口到巴吉米尔 (Baguirmi)、博尔努和豪萨 (Hausa) 城邦, 有些作坊的雇佣人数多达 10 人。^③

① Jacques Blache et F. Miton, *Première Contribu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Pêche dans le Bassin Hydrographique Logone - Chari Lac Tchad*, Paris, Editions de l'ORSTOM, 1962.

② Dixon Denham, Hugh Clapperton and Walter Oudney,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in the Years 1822, 1823, and 1824*, London: John Murray, 1828.

③ Heinrich Barth,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1849 - 1855*, London: Frank Cass, 1965.

就冶铁业而言，米什科瓦阶段的定居点出现了两座锻造熔炉的记录。一座部分露天的熔炉位于布雷土丘 B (OH III)，呈圆形，直径 1.6 米。另一座位于胡鲁夫 (OH IV)，直径 0.75 米。这座熔炉布满了厚厚的火山灰沉积物和大块的煅烧粘土墙碎片，在其底部发现了一堆重 0.2 公斤的海绵状铁渣。在熔炉东南侧一个捡骨重葬的墓里，发现了一个 6~9 岁儿童的头盖骨和一个铁臂环，铁臂环被认定属于这个未受割礼的男孩。

(三) 布雷阶段

生产活动的范围和多样性在布雷阶段 (公元 1000 年—1400 年) 达到顶峰。这些活动包括制陶、鱼肉加工和熏制、铁加工和制盐。这一阶段制陶工艺尤其发展迅猛。布雷 A 阶段 (公元 1000 年—1200 年) 出现的器皿形状为 1 至 17 种，而布雷 B 阶段 (公元 1200 年—1400 年) 出现的器皿形状为 3 至 50 种。布雷土丘聚落群出现了人像和动物陶俑以及粘土头枕的生产。

在布雷土丘聚落群的 5 个遗址中，有 4 个遗址出现了鱼肉加工熏制的操作记录。布雷土丘 A (OH VIII、X 和 XI) 有 1 至 3 处遗迹，布雷土丘 C (OH VIII) 有 3 处，布雷土丘 D (OH VIII) 有 5 处，布雷土丘 E (OH II 至 V) 似乎专用于以制油为目的的鱼肉加工。在挖掘探测中发现的大量水壶状容器或罐子可能就用于储油。在对定居点建筑群的所有 5 个土丘进行表面检查后，发现了 900 多个熏鱼的“烤炉”，这表明在该遗址被摧毁时，当地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在布雷土丘 D 挖掘出的 5 个熏鱼遗迹中，作为地面样本挖掘的遗迹 4 在此处值得一提。该遗迹直径 0.8 米，深 0.45 米，底部灰层有一个捡骨重葬墓，从遗骸牙齿发育情况、墓中的 3 个玛瑙珠子、3 个正长岩石锤和 1 个公牛泥塑来看，遗骸属于一名年龄在 5~7 岁的儿童。生产遗迹和儿童头骨之间的关联在本例中再次出现。

在米什科瓦 (OH III) 和胡鲁夫 (OH VI) 两地出现了铁加工装置的记录。米什科瓦作坊有粉红色的坚硬外墙，用火煅烧过，墙面厚 0.2 米，直径 3~4 米，覆盖在两个儿童罐墓葬之上。这个直径为 1.2 米，开口向北的熔炉里内含一个用粘土做的未使用坩埚，其直径为 0.4 米。炉底保存高度为 0.25 米，其壁厚 0.1 至 0.15 米。风箱装置是精心设计的排气系统的一部分，位于北侧，包括两个直径 0.2 至 0.3 米、深 0.1 米的坑，以及两个细长对称的挖掘点，这两个挖掘点很可能是风口底片，长 0.45 米，宽 0.1 米，深 5 厘米。在作坊装置下用火煅烧的硬面层发现了儿童瓦罐墓，一个在北面，另一个在南面，它们与熔炉的距离相同。南面墓葬由 3 个瓦罐组成，北面墓葬由两个组成。根据牙齿发育情况来看，这两座墓葬中的儿童年龄都是 6~9 岁，他们的骨骼明显有受火炉高温炙烤的痕迹。

迹。在本例中，金属加工装置与儿童遗骸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该熔炉是为多个冶炼作坊设计的，并结合了当地沼铁矿的特点。在沉积物中发现了少量铁渣。

胡鲁夫 (OH VI) 的铁匠作坊包括 4 个不同的遗迹。有一套含两台锻造炉的设备，两台锻造炉直径 0.5 米，深 0.3 米，用回收的截顶大粘土容器制成，每台锻造炉含有少量海绵状铁渣和一个正长岩石锤。在锻造炉东南侧和南侧有两个用火煅烧过的裸露表层，厚 0.2 米，长 1.2 米，宽 0.6 ~ 0.5 米。如同米什科瓦作坊所示，这些表层可能是更大的铁匠场所表层的一部分。

在胡鲁夫的同—占领层 VI 中存在制盐证据，该制盐区位于 110 平方米的挖掘单元的南半部，面积超过 60 平方米。这里有一个用火煅烧过的厚重圆形表层，裸露直径为 3.5 米，以及一个细长的壁炉状遗迹，面积为 0.8 米 × 0.75 米。8 个大罐子排列成两组：北边一组的 3 个罐子按照东西方向排列，南边一组的 5 个罐子按照东北—西南方向排列。用于制盐的原材料分别被装在这些罐子里，但是它们都未得到妥善保存，可能曾被故意毁坏，碎片遍布作坊。收集到的整套陶制材料装置包括 10 个用作盐水过滤装置的截顶罐子，10 个不同大小和形状过滤罐，62 个用于煮沸盐水以获得盐块的孔口罐（图 1）和大约 30 个印有人脸图案的水壶——这些水壶可能被胡鲁夫制盐商用作盛放粉末盐的容器。制盐区有两堆磨床、磨石、锤子等粗石手工艺品。记录的制盐材料呈现出令人费解的空间分布组合证据。整个装置散布成千上万的碎片，混合着破碎但可恢复的器皿，以及完整但分散的罐子和 24 个水壶。这种不符合有效生产操作的混乱分布表明，胡鲁夫的制盐设施曾遭到破坏性袭击。这一推测得到同一占领层中的一处儿童瓦罐墓的支持，从墓中的儿童牙齿发育情况来看，其年龄为 6 ~ 9 岁。实地考察期间收集到的民族历史资料显示，古代村落在遭到敌人突袭时，儿童通常被藏在大型粘土容器中。瓦罐中戴着两个铜合金环的儿童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藏在这个高 0.9 米、罐身最大直径 0.6 米、口径 0.45 米的大型粘土容器中。

盐可以从乍得平原的刺莱树和刺山柑等植物、咸水季节性池塘和盐渍沉积物中获得。无论浓盐水的来源是什么，都必须过滤并煮沸，才能获得盐。浓盐水煮沸是一个特别精细的过程，为了实现盐水的完全和均匀结晶，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煮沸，这需要复杂的专门知识和对整个过程的深入了解。一般来说，需要将浓盐水在恒定的低温下煮沸大约 24 小时，以避免不合时宜的结晶。制盐者在煮沸过程中使用长棒均匀搅拌溶液，不时加入少量浓盐水以保持模具充盈，防止碳酸盐和硫酸盐先于氯化钠沉淀。模具或锅的大小必须相似，以保持沸腾操作的协调。从理论上讲，同时煮沸的器皿数量取决于每个制盐者的监督能力。这意味着无法简单地通过增加锅的数量来实现更高的产量，而只能通过增加煮沸操作的生产线来达到这一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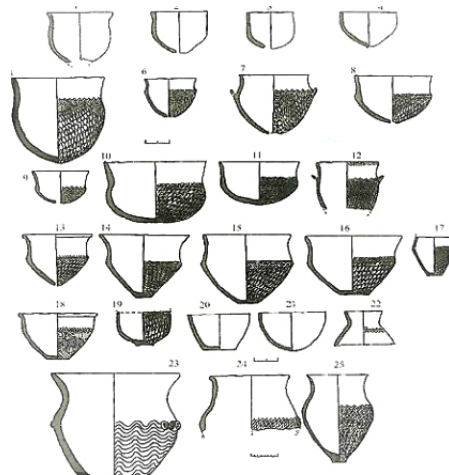


图 1 胡鲁夫布雷阶段制盐区出现的器皿形状样本

(四) 胡鲁夫阶段

目前为止所有记录的生产活动都在胡鲁夫阶段（公元 1400 年—1800 年）延续，当时胡鲁夫成为地区中心，出现了制陶、编织、冶金、鱼类加工和熏制以及制盐等活动。但如果从记录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有些活动的强度明显降低，A 阶段（公元 1400 年—1600 年）的器皿形状数量从 8 至 73 种下降到 B 阶段（公元 1600 年—1800 年）的 2 至 21 种。鱼肉加工熏制转移到阿玛施塔和索罗罗的腹地洼地雅哈雷，鲶鱼是当地考古记录中出现的唯一鱼类。在阿玛施塔发现了鱼肉发酵坑，一个在 OH I，5 个在 OH II。这些鱼肉发酵坑一般呈钟形，深 1.1 至 1.3 米，直径 1.1 至 1.4 米，内部涂抹光滑的粘土。这些遗迹似乎是大型鱼类加工聚落群的一部分，聚落群包括熏制设施和发酵坑。在阿玛施塔（OH III）和索罗罗（OH I 和 OH II）都发现了熏制遗迹均为圆形迹，直径 0.6~1 米，深 0.2 米，里面全是灰烬。索罗罗（OH I 和 OH II）的两个样本都包含一个“药罐”，位于遗迹底部挖掘的一个小坑中。

胡鲁夫（OH VII）的制盐装置集中在挖掘探测点的东南角，约 24 平方米。这个制盐装置包含一个用火煅烧过的硬面层，一个布满灰的小坑；一个由大型普通锥型容器为底的盐水过滤装置，已在原地被压碎；一个用截顶的大罐子制成的支撑装置，里面有一个普通的大半球碗，用于盛放过滤后的盐水；还有 5 个以东北—西南方向排列、朝下放置的大罐子，可能是盐水储存设施；以及 3 个水壶，其中两个为普通水壶，另一个上面刻有雕像。在盐水过滤装置东侧相对的位置上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动物雕像，一只小河马和一只成年河马。小河马站在成年河马腹部的西侧，头朝上，嘴巴作吮吸状。成年河马面向相反的方向，头朝上，嘴巴

张开。雕像必定含有某些象征和仪式意义，但难以破译。

胡鲁夫 (OH VII) 的金属加工装置位于挖掘单元的东北角。在一个“精英”墓地旁边发现的露天铁匠作坊包括 3 个遗迹。布满大碎片的熔炉底座直径为 0.8 米，熔炉壁平均厚度为 5 厘米，目前保存的高度为 10 厘米。圆形锻炉背靠一堵 0.2 米厚、1.1 米长的新月形墙，最大直径为 0.6 米，风口由回收的大壶颈制成，目前仍位于东部。最后是一个马蹄形壁炉，长 0.5 米，宽 0.4 米，深 0.2 米，壁厚 0.15 米。在沉积物中收集到 280 克的少量铁和铜渣，这表明当地铁匠重复利用了外来的铜或用铜合金制成的废弃物品。所有在研究区域记录的铜制手工艺品都是用失蜡技术制作的 (图 2)。这一结论得到了对从胡鲁夫 (OH VII) 墓地收集的 19 件手工艺品样本进行金相分析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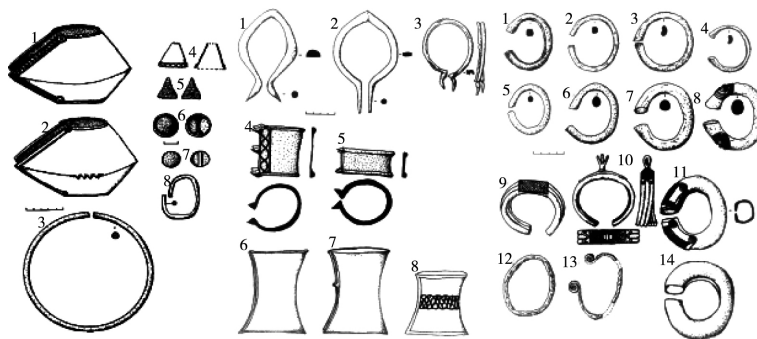


图 2 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样本: 1-2: 手环 [弓箭手]; 3: 项圈; 4: 铃铛;
5: 锥形体; 6-7: 纽扣; 8: 皮带扣, 马刺和护腿器, 臂带和脚镯

除铜外，在所有研究的手工艺品中发现比例高于 1% 的 3 种主要成分为锡、铅和锌，铜的占比从 61.2% 到 89.45% 不等。金属成分的差异性与手工艺品特定类型或考古发现环境不存在关联。所有研究的手工艺品都是三级合金，铜-锌-锡-铅和铜-铅-锡-锌是主要的组合方式。在某些手工艺品中，还意外发现了一定含量的铁和砷。铁的反复出现是由于使用了标准的铁加工装置，而金属成分组合的差异性是由于系统性的回收利用所致。从其异质成分的角度考虑，胡鲁夫的物品很可能是通过重新铸造来自不同地方的废弃物品而获得。在这种情况下，金相分析对研究来源几乎没有帮助，而只能说明当地工匠的技艺。

仅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记录来看，商品生产的多样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模式与本文讨论的所有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指标都是严格同步的。从研究区域定居点的第一阶段开始，制陶就出现了。制陶、铁加工、鱼类加工和熏制始于克雷纳克阶段自给自足的自治村庄。在米什科瓦阶段，出现了编织、染布和更加多样化的陶器生产，该阶段形成了两个政体的相互竞争。一些生产遗迹出现了特殊的仪式。在胡鲁夫 (OH III) 陶器烧制区出现了供奉的绵羊或山羊肉，在胡鲁夫

(OH IV) 锻造炉下出现了一个“药罐”和儿童头骨。工艺多样化和集约化在布雷阶段达到顶峰,当时胡鲁夫和布雷土丘聚落群政体之间的竞争加剧。米什科瓦(OH III)的铁加工遗迹和布雷土丘 D 的熏鱼“烤炉”中都发现了儿童遗骸。布雷土丘聚落群出现了大量粘土头枕和陶俑,以及密集的鱼肉加工和熏制活动的记录。胡鲁夫(OH VI)出现了密集的制盐活动,生产的盐使用特制的容器包装。随着胡鲁夫逐渐成为区域中心,所有的主要生产活动仍在持续,但制盐活动的强度降低。一些生产遗迹出现了献祭祝祷物品,如索罗罗(OH I 和 II)熏鱼坑和胡鲁夫(OH VII)锻造炉中的“药罐”,以及胡鲁夫(OH VII)盐水过滤装置中的河马雕像。在胡鲁夫地区生产的盐、鱼干和熏鱼、粘土头枕和染布等商品属于外流商品,是 19 世纪史料中充满活力的地区经济的一部分。

交换模式

上述胡鲁夫政体涌现期间的经济政治变革至少部分是通过从远方流入的商品维持的。乍得平原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外露岩石的沉积盆地,因此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所有岩石材料都是外来的。用于生产重负荷日常工具的粗石来自东北部 150 公里处的哈杰尔哈米斯(Hadjer el Hamis)和西南部 200 公里处的莫拉-瓦扎-曼达拉(Mora - Waza - Mandara)地区。铜合金手工艺品、红玉髓、玛瑙和玻璃珠等奢侈品(贵重物品)是通过跨撒哈拉的长途贸易网络获取的。这一部分将讨论这些外来商品的流入、分布和消费,以评估它们对胡鲁夫政体形成的影响。早期德格塞阶段的定居点没有出现任何长途交换而来的材料。因此,研究区域应该在克雷纳克阶段进入长途交换网络。

在克雷纳克阶段 6 个有记录的定居点中,在 3 个定居点的沉积物中发现了少量外来商品(表 1)。在 3 个采购区中,不同遗址出现的外来商品的频数和组合都有所不同。经检测,在胡鲁夫(OH II)和布雷土丘 D(OH I)发现了几乎同等数量的来自西南部的原材料(正长岩和石英岩),在克雷纳克(OH V - VI)则发现了单一样本。在胡鲁夫和布雷土丘 D 各发现了来自东北部哈杰尔哈米斯的一块流纹岩。最终只在胡鲁夫发现了来自西北部的商品:一个玛瑙珠和 4 个铜合金纽扣。所有这些手工艺品都是在考古沉积物中、房屋地面上和庭院中收集的,而非在某个特殊装置中。4 个铜合金纽扣可能缝在一件衣服上,但衣服已经消失。在米什科瓦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长途交换商品的数量和多样性增加,从 5 种原材料制成的 21 件样本增至 9 种原材料制成的 121 件样本(表 2)。

表 1 克雷纳克阶段（公元元年—500 年）定居点的长途贸易商品的分布情况

来源区原材料	SW				NE	NW		总计
	S	Q	M	G	R	C	CA	
德格塞 III - VII	-	-	-	-	-	-	-	-
克雷纳克 V - VII	-	-	-	-	-	-	-	1
胡鲁夫 II	5	1	-	-	1	1	4	12
布雷土丘 A I	-	-	-	-	-	-	-	-
布雷土丘 B I	-	-	-	-	-	-	-	-
布雷 D I	7	-	-	-	1	-	-	8
总计	13	1	-	-	2	1	4	21

图例：CA：铜制手工艺品；C：红玉髓；G：花岗岩；M：微闪长岩；Q：石英岩；R：流纹岩；S：正长岩；SW：西南；NE：东北；NW：西北

这些样本出自 7 个定居点（共 11 个定居点）。其中主要为来自西南部采购区的粗石材料，共 88 件样本。其次是从西北部贸易网络（27 件样本）和东北部哈杰尔哈米斯采购区（11 件流纹岩手工艺品）获得的 12 种材料。在布雷土丘 A（OH II）发现了一个重 30 克的椭圆形天河石（一种浅蓝绿色半宝石吊坠），长 5 厘米，宽 4.5 厘米，最大厚度为 1.2 厘米。已知最近的天河石产区为研究区域以北 1000 多公里处的提贝斯提（Tibesti）山区。在胡鲁夫（OH III）发现了一小块红色赭石，在胡鲁夫（OH III 和 IV）墓葬中也发现了红色赭石的证据，其来源并不确定，但很可能来自西南采购区。

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分布在胡鲁夫（OH III - IV）。这里汇集了 121 件长途贸易物品中的 104 件。在生活空间和整个文化沉积物中都发现了用于制造日常重负荷工具（用于食物烹饪和手工艺活动）的粗石材料。奢侈品或贵重物品只出现在胡鲁夫的墓葬中，但出现在布雷土丘 A 的生活空间中。胡鲁夫和布雷土丘聚落群成为远程贸易网络的主要参与者。所有其余定居点都出现一种单一类别的原材料，即来自西南采购区的正长岩，频数从 1 到 3 不等（表 2）。

表 2 米什科瓦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定居点长途贸易商品的分布情况

来源区原材料	SW				NE		NW	其它	总计
	S	Q	M	G	R	C	CA		
德格塞 V - III	-	-	-	-	-	-	-	-	-
克雷纳克 VI - VII	-	-	-	-	-	-	-	-	-
胡鲁夫 III - IV	58	3	4	1	11	25	1	1 块红赭石	104
布雷 A II - IV	12	-	-	-	-	1	-	13	-
布雷 B II - IV	-	-	-	-	-	-	-	1 件天河石吊坠	1

布雷 D II – IV		–	–	–	–	–	–	–	–
布雷 E I	2	–	–	–	–	–	–	–	2
哈梅 I – III	2	–	–	–	–	–	–	–	2
马达夫 I – III	2	–	–	–	–	–	–	–	2
米什科瓦 I – II	3	–	–	–	–	–	–	–	3
克雷纳克 – 荇 I – IV	1	–	–	–	–	–	–	–	1
总计	80	3	4	1	11	26	1	2	121

图例：CA：铜制手工艺品；C：红玉髓；G：花岗岩；M：微闪长岩；Q：石英岩；R：流纹岩；S：正长岩；SW：西南；NE：东北；NW：西北

在布雷阶段（公元 1000 年—1400 年）的 10 个定居点中，有 7 个出现了长途贸易商品的记录。商品和原材料的数量和多样性普遍增加，包括由 10 种不同材料制成的 168 件商品（表 3）。其中主要是来自西南部采购区的商品，共 104 件；其次是来自西北部贸易网络的 23 件商品；再次为来自东北部采购区的 10 件流纹岩手工艺品；还有 1 颗玛瑙珠、1 块红赭石、4 个方解石唇盘和 22 枚子安贝（*Cypraea moneta*）的来源未知。然而，正如同时段流动商队（Mac den Ijâfen）的商品一样，玛瑙珠和子安贝很可能是通过跨撒哈拉的贸易网络获得的。如前所述，红赭石最有可能产自西南部采购区。商品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除 7 件商品外，其余商品全部在布雷土丘（表 3）。所有的贵重物品，包括 1 颗玛瑙、10 个红玉髓珠、13 个铜合金锥、4 个方解石唇盘和 20 枚子安贝，都是在墓葬环境中发现的。粗石材料、正长岩、微闪长岩、花岗岩和流纹岩用于生产磨床、磨石、捣具、锤石等重负荷工具。在布雷阶段定居点聚落群的所有土丘中发现了数百个正长岩小球（未列在表格中），它们可能是在布雷 B 阶段末期（约公元 1300 年—1400 年）定居点遭到毁灭式袭击时被用作弹弓子弹。

表 3 布雷阶段（公元 1000 年—1400 年）定居点长途贸易商品的分布情况

来源区原材料	SW				NE	NW			其它	总计
	S	Q	M	G	R	C	CA	Cal		
德格塞	–	–	–	–	–	–	–	–	–	–
胡鲁夫 V – VI	–	–	–	–	–	–	–	–	–	–
布雷 A V – XV	50	–	3	2	7	4	–	–	1 颗玛瑙珠	67
布雷 B V – XIII	5	–	–	1	–	–	–	–	–	6
布雷 C I – VIII	10	–	1	–	4	3	13	4	20 枚子安贝 1 块红赭石	56
布雷 D V – VIII	14	–	–	–	2	–	–	–	–	16
布雷 E II – V	10	–	1	1	1	3	–	–	–	16
哈梅 IV	4	–	1	–	1	–	–	–	–	6

古代乍得湖地区胡鲁夫政体政治经济形态演变

马大夫 IV - V	-	-	-	-	-	-	-	-	-	-
米什科瓦 III - V	1	-	-	-	-	-	-	-	-	1
总计	97	-	6	4	15	10	13	4	22	168

图例: Cal: 方解石; CA: 铜制手工艺品; C: 红玉髓; G: 花岗岩; M: 微闪长岩; Q: 石英岩; R: 流纹岩; S: 正长岩; SW: 西南; NE: 东北; NW: 西北

胡鲁夫阶段 (公元 1400 年—1800 年) 记录的长途贸易商品从此前布雷阶段的 168 件急剧上升至 1138 件, 出现了 9 种原材料。其中最主要是来自西北贸易网络的商品, 共 1014 件, 含铜合金手工艺品、红玉髓珠和玻璃珠等。它们只存在于胡鲁夫 (OH VII - VIII) 的墓葬中, 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粗石主要来自西南部, 还有少量来自东北部的流纹岩手工艺品。区域分布向胡鲁夫倾斜, 这里集中了所有的贵重物品, 123 件粗石手工艺品中有 75 件位于胡鲁夫 (表 4)。胡鲁夫政体、哈梅 (OH V)、马大夫 (OH VI) 和米什科瓦 (OH VI) 的村庄和小村落有 2 至 4 种岩石制成的 10 至 19 件粗石手工艺品。阿玛施塔 (OH I - III) 和索罗罗 (OH I - II) 的季节性定居点有 3 至 5 件粗石手工艺品, 全部来自西南部采购区。

表 4 胡鲁夫阶段 (公元 1400 年—1800 年) 定居点长途贸易商品的分布情况

来源区 原材料	SW		NE			NW	未知		其它	总计
	S	Q	M	G	R	C	CA	Cl		
德格塞	-	-	-	-	-	-	-	-	-	-
胡鲁夫 VII - VIII	55	3	13	-	4	940	71	3	1 块红赭石	1090
哈梅 V	9	-	-	-	1	-	-	-	-	
马大夫 VI	12	-	4	1	2	-	-	-	-	19
米什科瓦 VI	6	-	4	-	1	-	-	-	-	11
阿玛施塔 I - III	-	-	21	-	-	-	-	-	3	
索罗罗 I - II	5	-	-	-	-	-	-	-	-	5
总计	87	3	23	2	8	940	71	3	11138	

图例: CA: 铜制手工艺品; C: 红玉髓; G: 花岗岩; Gl: 玻璃; M: 微闪长岩; Q: 石英岩; R: 流纹岩; S: 正长岩; SW: 西南; NE: 东北; NW: 西北

总体而言, 研究区域长途贸易商品的流动持续增加, 从 21 件增至 1141 件 (表 5), 商品的区域分布和流动呈现出有趣的变化。胡鲁夫和布雷土丘聚落群汇集了克雷纳克阶段 (公元元年—500 年) 所有 3 个来源区域的全部商品, 频次从 12 到 8 不等, 来自西南部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在米什科瓦阶段 (公元 500 年—1000 年), 胡鲁夫在商品总量和多样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令其他 6 个拥有 1 至 13 件长途贸易商品样本的定居点望尘莫及。在布雷阶段 (公元

1000 年—1400 年), 布雷土丘聚落群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来自所有 3 个来源区的由 10 种原材料制成的 161 件商品。其他定居点哈梅 (OH IV) 和米什科瓦 (OH III - V) 有 1 至 6 件粗石手工艺品, 主要来自西南部, 有一件样本来自东北部。在胡鲁夫阶段 (公元 1400 年—1800 年), 当布雷土丘聚落群衰败后, 胡鲁夫又重回领先地位。在此期间, 胡鲁夫政体及其中心定居点垄断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当时明显存在两个不同的交换网络。其中一个连接西南和东北区域, 涉及采购和转移粗石材料, 这些粗石材料用于生产日常生活和手工艺活动中使用的重负荷工具。另一个连接至西北贸易网络, 整体上与跨撒哈拉交换网络相连, 主要用于交换彰显地位的贵重物品。迄今所研究的这些长途物品交换系统的运作情况尚不清楚, 但仍然可以使用一些模型来理解现有的考古记录。

表 5 长途贸易商品的长期流入

阶段	定居点数量	西北部商品	西南部商品	北部商品	未知来源	总计
德格塞 (1900 BCE - 0 CE)	2	-	-	-	-	-
克雷纳克 (0 - 500)	6	5	14	2	-	21
米什科瓦 (500 - 1000)	11	27	88	12	1	128
布雷 (1000 - 1400)	10	23	122	15	26	186
胡鲁夫 (1400 - 1800)	7	1014	115	8	4	1141
总计	2 - 11	1069	339	37	31	1476

运送货物进出研究区域的运输系统可能包括船只、畜力运输和人力运输。雨季汛期高峰时, 可以在整个乍得平原上使用独木舟航行, 最远可抵达南部 250 公里以外的瓦扎国家公园 (Waza National Park)。干旱季节则使用畜力运输和人力运输。雨季和旱季高峰期的劳动力需求不大, 是长途远征和贸易活动的最佳时期。

就粗石贸易而言, 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莫拉 - 瓦扎 - 曼达拉山区, 以及乍得共和国的哈杰尔哈米斯岛山周围, 存在大量有关采石场和石器作坊的记录。采购区分别位于两个采石场西南方直线距离 200 公里处和东北方直线距离 150 公里处。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来自研究区域的人们直接采购粗石的可能性。然而,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不仅需要准确了解可开采裸露岩石的地理位置, 还要掌握不属于平原文化的岩石开采技能。获得粗石材料的“最小成本”战略可能包括与当地团体的双向交换制度。交换伙伴们会定期聚集, 在雨季乘坐独木舟, 在旱季则使用畜力运输或人力运输。食物、谷物、新鲜或熏制的鱼和布匹也可以用来交换散装或已经成型的粗石手工艺品。

通过贵重物品交换网络可以获得铜合金、子安贝、红玉髓和玻璃珠, 而这一交换网络通过博尔努市场与跨撒哈拉贸易网络相连。红玉髓珠可能来自西非和亚

洲。铜锭可以从博尔努市场获得，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初铜锭在博尔努市场被用作货币。从布雷 A 阶段（公元 1000 年—1200 年）开始，铜锭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获得。首先，从博尔努市场可以轻易获得铜锭，它们在那里被用作货币，以换取出售的商品。根据德纳姆（Denham）等人的研究，19 世纪博尔努王国最大的市场安戈努（Angornu）对铜或铜合金的需求很高。^①其次，在研究区域游走的商队也使用铜锭进行支付。在这种跨越文化界限的情况下则需要重新解读财富象征。因此，在研究区域，由铜锭和铜合金锭组成的外币所积累的物质资本被转化为更高级的象征性资本，对于区域精英的涌现和巩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长途贸易网络进入胡鲁夫政体的货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用商品，主要是用于制造日常生活中磨床、磨石、石锤、捣具等家用设备的粗石材料；另一类是从物质转化为象征资本的贵重物品，用于宣示和彰显社会地位。从胡鲁夫中心遗址收集的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样本为 105 件。从米什科瓦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的沉积物中收集了 5 件样本。布雷阶段（公元 1000 年—1400 年）共 30 件，胡鲁夫阶段（公元 1400 年—1800 年）则达到峰值 70 件。从布雷阶段的 9 座墓葬中收集了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但它们主要集中于 75 号墓和 81 号墓，这两座墓包含了 30 件手工艺品中的 18 件。墓葬中的马刺显然是用于控制马匹，而护腿器则是在骑兵交战中用于保护骑马者的腿部和脚踝不被敌人刺伤。这些与骑马相关的物品表明，布雷阶段存在一支精英战士队伍（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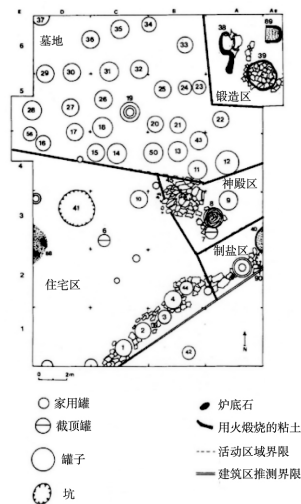


图 3 探测点北半部的胡鲁夫（OH VII）阶段定居点，
存在一个专供统治阶层使用的墓地

① Dixon Denham, Hugh Clapperton and Walter Oudney,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in the Years 1822, 1823, and 1824*, London: John Murray, 1828.

胡鲁夫阶段的精英墓地（公元 1500 年—1600 年）

在胡鲁夫阶段（公元 1400 年—1800 年），社会分化更加明显，社会等级差异趋于扩大。在坚固土城墙的保护下，胡鲁夫成为当时各政体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并且建立了一座专供统治阶层使用的“精英墓地”（图 4）。在墓地中，密集的大型器皿被用作墓碑，排列在一个中央纪念碑周围，并且遵循严格的墓葬礼仪。精心设计的殡葬方案使用了大量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红玉髓珠和其他外来原材料。墓地分为 4 个墓群，每个墓群有 4 至 8 座墓，分布在中央纪念碑周围。对胡鲁夫阶段墓地进行详细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和其他外来物品的社会用途。

胡鲁夫阶段的墓地为公元 1500 年—1600 年间所建，在胡鲁夫挖掘探测点北部不到 40 平方米的空间内密集分布了 25 座墓（图 5）。墓葬是由 1 至 3 个叠加的大型粘土器皿标记的，粘土器皿没有与骨骼直接接触，因此可确定其用途为“墓碑”。所有死者下葬时均为坐姿，与雕像罐中央纪念碑一样面向西南，双脚放在一个大罐子里。墓地分为 4 个墓地群，分别位于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



图 4 胡鲁夫阶段精英墓地的局部视图

东南墓群包括 8 座墓。埋葬设施由 1 至 3 个大型器皿墓碑和 1 至 2 个用于放脚的罐子组成，但有一个例外（20 号墓）。每座墓葬中的陪葬品包含 1 至 12 件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但有一个例外（22 号墓），5 至 174 颗红玉髓珠，1 至 3 件粗石手工艺品，以及 2 件陶俑。西南墓群由 7 座墓组成，每座墓中有 1 至 2 个大型器皿墓碑和 1 至 3 个罐子。4 座墓中记录了 1 至 3 件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1 至 58 颗红玉髓珠、1 颗玻璃珠、2 件陶俑以及 1 至 3 件粗石手工艺品。在西北墓群中有 6 座墓，在 4 座墓中都有一个大型墓碑和一个放脚的罐子。从 4 座墓中收集到 1 至 7 件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以及 3 至 42 颗红玉髓珠、1 件陶俑和 3 件粗石手工艺品。最小的东北墓群由 4 座墓组成，每座墓中都有一个大型器皿墓碑和

一个放脚的罐子。其中 2 座墓葬记录了 3 至 7 件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以及 8 至 134 颗红玉髓珠和 1 至 2 件粗石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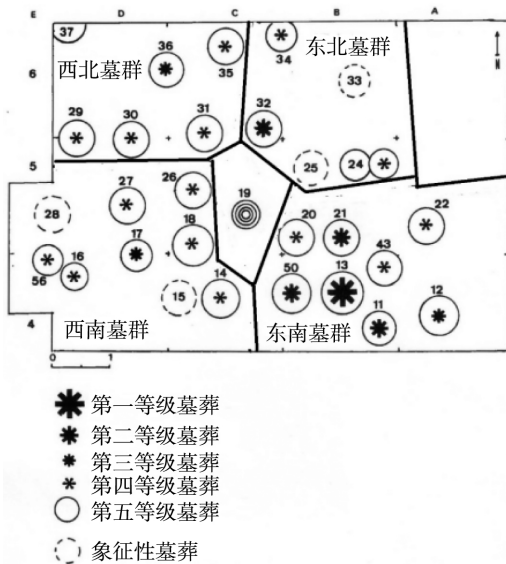


图 5 胡鲁夫阶段墓地的组织结构，墓葬存在等级划分

墓葬品的分布差异表明某些墓葬主人地位较高，积累了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不同物品。除了以铜臂环和戒指、红玉髓珠、玻璃珠和粘土珠为代表的个人装饰品外，一些特殊的物品，如臂圈、护腿器和马刺，都表明墓主人是地位显赫的战士和骑兵。在 11 号墓和 20 号墓中发现的臂带用于保护手腕免受弓弦的反弹，因此属于弓箭手的设备。这两个臂带较为笨重，分别重 0.65 和 0.75 公斤，由两块弯曲和焊接的铜或铜合金片制成。护腿器也是用弯曲的铜或铜合金片制成，用于保护骑马者的腿和脚踝免受敌人的剑击。在 5 座墓（11、13、27、34 和 50 号墓）中发现了护腿器，重 0.64 至 0.31 公斤。最后，在 12、17 和 21 号墓中发现了为骑马者设计的马刺。关于墓葬设施和墓葬品分布，详见表 6。

表 6 墓葬设施和墓葬品的分布

遗迹编号	墓碑	脚罐	铜制手工艺品	红玉髓珠	粘土珠	粗石
东南墓群						
11 号墓	3	1	12	115	—	—
12 号墓	3	1	5	42	—	—
13 号墓	2	1	9	174	1	—
20 号墓	1	—	1	11	—	3
21 号墓	1	1	4	136	—	1
22 号墓	1	1	—	7	1	3

43 号墓	2	2	1	5	—	1
50 号墓	1	1	9	126	—	—
总计	14	8	41	616	2	8
西南墓群						
14 号墓	2 —	—	4	—	1	
16 号墓	2 3	3	3	—	—	
17 号墓	2 1	2	58	1	3	
18 号墓	2 1	—	18	—	—	
26 号墓	1 1	1	15	1	—	
27 号墓	1 1	2	10	—	2	
56 号墓	1 1	—	1	—	—	
总计	11	8	8	106	2	6
西北墓群						
29 号墓	1 —	—	—	—	1	
30 号墓	1 1	7	5	—	1	
31 号墓	1 1	1	—	—	—	
35 号墓	1 1	—	3	—	1	
36 号墓	1 1	4	42	1	—	
37 号墓	1 —	—	—	—	—	
总计	6 4	12	50	1	3	
东北墓群						
23 号墓	1	1	—	—	—	1
24 号墓	1	1	—	—	—	—
32 号墓	1	1	7	134	—	—
34 号墓	1	1	3	8	—	2
总计	4	4	10	142	—	2

在已确认的 4 个墓群中，有 2 个墓群发现了来自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高等级个体，东南墓群最为集中。东南墓群包括 13 号墓，墓主人的等级最高，墓葬品包括 174 颗红玉髓珠、2 个护腿器和 7 个臂环；第二等级包括 11、21 和 50 号墓，11 号墓中有 115 颗红玉髓珠、4 个臂环、2 个戒指、2 个护腿器、1 个臂带，2 个铜或铜合金服装饰品；21 号墓中有 136 颗红玉髓珠、1 个臂环、1 个戒指和 1 块粗岩；50 号墓中有 126 颗红玉髓珠、7 个臂环和 2 个护腿器。

与红玉髓珠的分布相反，铜或铜合金手工艺品仅在 29 座墓中的 16 座中出现。主要由个人装饰品、在 14 座墓中发现的 32 个臂环、18 个戒指和 2 件服装饰品组成。只有 9 个墓主人拥有战士和骑兵地位的象征物：13 号墓为第一等级，11、21、32 和 50 号墓为第二等级，12 和 17 号墓为第三等级，20、27 和 34 号墓

为第四等级。外来贵重物品显然用于区分社会等级。

胡鲁夫政体的演变

不断变化的定居模式、手工艺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政治转型相互作用，产生了特定时空的世界观，或多或少地为稳定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支持。在胡鲁夫地区长达 4000 年的考古序列中发现了四个连续的社会形态。

最早的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未知的。德格塞阶段的考古证据难以捉摸，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特征描述。德格塞 I—II 和克雷纳克 I 两个定居点的粪便沉积物很厚，位于湖泊环境中，很可能是季节性的定居点，居民为流动的牧民觅食者。在将近 2000 年的时间里，游牧群体可能断断续续地到访过这些沙岛上的营地，但他们从哪里来，多久来一次，停留多长时间，仍然未知。

在克雷纳克 A 阶段（公元元年—250 年），研究区域西北部 3 个几乎等距的小村庄德格塞、克雷纳克和胡鲁夫为混合农业群体定居点。他们属于第二个社会形态的一部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使用铁器的自治农民群体，与长途贸易网络松散相连。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可能是由平等的农户组成，由一个不受约束的酋长领导。随着克雷纳克 B 阶段（公元 250 年—500 年）布雷土丘 A、B 和 D 三个新村庄的建立，定居点进一步向东南扩展，这时开始形成村落群。

在米什科瓦 A 和 B 阶段（公元 500 年—1000 年），遗址进一步集聚，形成了第三个双极性的社会形态。每一极由 5 个定居点组成：东南部的布雷土丘 A、B、D、E 和克雷纳克—苔，西北部的德格塞、胡鲁夫、克雷纳克、马达夫和哈梅，以及南部的嵌入式自治村米什科瓦，聚落点的大小不详。然而，我们可以假设，实际的定居点可能以一个相对较大的村庄为中心，胡鲁夫位于西北部，布雷土丘 A 位于东南部，周围是更小的村庄和小村落。社会政治制度包括高于村落或村庄一级的更高级的决策单位，以处理区域和次区域问题。布雷阶段为同样的社会形态，竞争性集群之间的对抗加剧。更密集和更集中的系统面临更大社会政治压力，以及进入长途贸易网络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主要遗址周围的定居点开始重组。克雷纳克和克雷纳克—苔被遗弃，布雷土丘 C 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陶器形状和装饰的相似之处似乎表明，此前的自治村庄米什科瓦已被纳入胡鲁夫的势力范围，此时出现了战士身份和战争的证据。胡鲁夫在布雷 B 阶段遭到突袭，后来可能通过抢劫布雷土丘聚落群发起了回击。这一阶段工艺专业化的扩大和拓展、生产的持续强化和交换流动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胡鲁夫统治集团得以调动大规模的劳动力建设包括护城河和土城墙在内的防御系统，以及统治者的宫殿建

筑群。随着布雷土丘聚落群的消亡，胡鲁夫在公元 1400 年左右的布雷阶段末期成为区域中心。

第四个社会形态，即胡鲁夫政体，出现在胡鲁夫 A 阶段（公元 1400 年—1600 年）。起初定居点的数量从 10 个降至 3 个，集中于研究区域的西北部，并沿德格塞—胡鲁夫—阿玛施塔按南北方向排列。之后在胡鲁夫 B 阶段（公元 1600 年—1800 年），定居点数量从 3 个增至 7 个。以前被遗弃的定居点，如马达夫、哈梅和米什科瓦，重新有人居住，索罗罗建立了一个新的捕鱼地点。这个新的定居点系统有三层等级，其中心为腹地洼地雅哈雷。社会政治制度中有一个维持领土统一的统治者，胡鲁夫精英公墓中心的雕像罐子可能象征着统治者。多元化的精英阶层包括战士、骑兵、弓箭手、行政人员和礼仪专家组成的群体，可能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派别（氏族），他们相互争夺权力和威望，企图垄断获得长途贸易奢侈品的途径。该阶段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手工艺专家，包括泥瓦匠、木匠、陶工、铁匠、织工、商人、盐商、造船商等。城市大门、土城墙和统治者宫殿的维护可能基于一种周期性的苦役劳动。

政治行政组织运作的资金来源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税收制度，16 世纪进入胡鲁夫的阿拉伯牧民必须每年上交贡品。商队、独木舟捕鱼队和（或）赞助人可能需要支付安全和许可费才能开展商业活动。根据民族史记载，城市官员根据其级别可获得相应份额的粮食收成、蜂蜜、宰杀的动物、狩猎物和捕鱼产品，他们还可获得劳工为其庄园劳作。胡鲁夫阶段建立了三个重要的社会政治机构，构成了地方政治制度的最高机构。这个政治三合会由执政的首领（拉万语中叫 Mra 或 Miarre，阿拉伯语叫苏丹）来领导。首领之下是同等级别的土地酋长（今天胡鲁夫的加拉迪马）和首席祭祀者。前者负责生产和土地分配，发放捕鱼、狩猎、采蜜以及野生植物和矿产资源开发许可。后者负责主持广泛的仪式表演，包括割礼、成年礼、宗教庆典以及赎罪仪式（在胡鲁夫挖掘之初，当时的祭祀官就宰杀了一只成年公羊，并在准备挖掘的地方洒下了羊血）。这些官员是世袭的，官职代代相传，由长子继承。尽管受到连续的大规模政治和行政变革的严重影响（特别是从殖民时期到现代喀麦隆这段时间），但古代胡鲁夫政体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很活跃。然而，随着 80 多岁的哈桑纳（Hassana）苏丹在 1988 年去世，这种制度崩溃了。

在胡鲁夫 B 阶段公元 1600 年至 1700 年的某一天，胡鲁夫政体被扩张的拉万王国征服。这个王国保持了非洲广泛的“神圣而隐蔽的亲属关系”传统。国王居住在臣民看不见的宫殿里，只在每周的公众见面日隐蔽在芦苇帘后，通过发言人向他的臣民讲话。即位仪式要求王子完全隐居 40 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肉体将蜕变成王国永恒统一的化身，他以人类的身份死去，以国王的身份重生。根

据民族志研究证实的民族历史记录，此前独立的胡鲁夫政体的社会政治组织没有随着被拉万王国吞并而改变。由于其此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得到广泛认可，“胡鲁夫领土”被赋予了几乎完全自治的特殊地位。胡鲁夫的统治者每年只需在年度节日期间朝拜一次拉万国王，带来一些当地的泥土，用于修复洛根－比尔尼土城墙，以示臣服。

结 论

胡鲁夫地区的考古项目成功追溯了全新世晚期发生重大气候变化时该地区长期的社会政治变化。乍得湖消退为中部乍得语族使用者定居点扩张提供了新的契机。重构的考古景观展现了 4000 年的文化发展。胡鲁夫政体的涌现和变革受到四个连续的社会形态影响。目前为止最初和最长文化序列的社会形态由分散的移动牧民觅食者或游牧群体构成，他们充分利用季节性变化于枯水季在沙岛上扎营。第二个社会形态从公元纪年之初开始，持续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期，由等距离的自给自足的自治混合耕作村庄构成，这些村庄与长途贸易网络松散相连。第三个社会形态由区域内相互竞争的同类政体构成，从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持续至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中期，这一阶段形成了工艺专业化和生产集约化，并持续与长途贸易网络相连。最后第四个社会形态即中央集权的胡鲁夫政体，从公元 1400 年左右开始，持续至公元 1800 年被洛根－比尔尼征服。从与跨撒哈拉贸易网络相连的长途交换网络中获得的贵重物品在当地精英阶层的涌现和巩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这些流入商品相交换的外流商品很可能是鱼干和熏鱼、盐、粘土头枕和染布。从“实用的”粗石材料到“贵重商品”交换领域，当地集约化和多样化的生产系统可能被当地精英控制，与加速流入的长途贸易商品可能有直接关联。

(责任编辑：凌 荷)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forming unit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anzania,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olonialism, ujamaa

Author: Liu Yu, Lecturer of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ulouf Polity in Ancient Lake Chad Region

[France] *Augustin F. C. Holl/Translated by Zhang Bo*

Abstract: Emergent complexit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per refers to an organizational shift in social formations, from small mobile pastoral groups, and sedentary agricultural villages, that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ly centralized and ranked society. It i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ollowed by speakers of Chadic languages who settled progressively in the Chadian plain in North Central Africa, after the gradual receding of Mid – Holocene Lake Chad.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steps of that evolutionary process through the lens of settlement dynamics,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ir connected patterns of exchange from 1900 BCE to 1800 CE. A short review of research on trade i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y shows that the study of long – distance exchange tends to focus on characterization and provenience analyses. As important as these two variables ar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xchange network, they do not provide access to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receiving societi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omitant changes in site – location, flows,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long – distance traded items, pattern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nsification, showing that they were part of interlocked feed – back loops. These deviating or amplifying feed back loops triggered a dynamic that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four successive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Houlouf region *ca.* 4000 years occupation sequence.

Keywords: emergent complexity, political economy, long – distance trade, Chadic polity, Houlouf

Author: Augustin F. C. Holl,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ume IX – XI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nd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Director of Africa Research Center, Belt and Road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

Translator: Zhang Bo,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 and the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Review of Chinese Research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frica (2006 – 2019)

Hu Dengquan and Wang Liping

Abstract: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fric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come a bond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frica started in 2006. Over the past 14 years, the studie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features. Related researches involv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frica are more and more, but not many specialized researches showed up, among which, area studies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enthusiasm among countries are very obviou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diverse, including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study content focuses on three “T” (Teachers, textbooks, teaching methods) ,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n Africa. Looking ahead, we should deepen the content of research, broaden the research scope, build teams and platforms, attract and cultivate scholars, and strengthen public opinion studies.

Keywords: African Confucius Institutes, research review, func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research, soft power

Author: Hu Dengquan, Deputy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 Wang Lipi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